

“钻研古戏文犹如钻研严峻的人生”

——怀念王季思

□曹凌云

在编辑《唐湜全集》的过程中，我多次读到唐湜先生怀念他的二舅王季思先生的文字，饱含深情，打动人心。上个月，与远在新西兰的王则椿先生通过微信视频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话题也始终没有离开他的父亲王季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与九叶派诗人唐湜先生有过频繁交往，当时我在温州市龙湾工作，唐湜多次说：我二舅王季思也可以说是龙湾人。就这样，我开始关注王季思先生的文史著作和生平故事。

王季思是如何与戏曲结缘的？得从他的家乡温州说起。温州是宋元南戏的发源地，在中国戏曲曲艺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戏曲在温州民间繁衍兴盛，流行昆剧、瓯剧、越剧以及和剧、高腔、木偶戏等。元末明初，温州剧作家高则诚潜心创作的《琵琶记》问世后蜚声剧坛，达到“演习梨园，几半天下”的盛况，代表了南戏艺术的最高成就。明清时期，由南戏演变而出的各种声腔剧种，传遍大江南北，而在温州更是戏文不断，逢年过节、求神祭祀，甚至老人寿、婴儿满月，常有戏班上台尽情演绎，营造氛围，余音绕梁。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季思出生在温州老城东郊的上田村。唐湜先生说：季思舅舅祖籍在龙湾永中的乌昌堡，家境殷实，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他从小就爱看戏，戏班在村里演戏的日子，就是他的节日，夜空、明月、树影，煤气灯闪闪亮亮，大幕后吹打打、演员们进进出出，都能让他兴奋。小小年纪的他，已纠结于戏台剧情的跌宕起伏和小生小姐的悲欢离合，懂得了憎恨嫌贫爱富的员外相公、同情守节尽孝的善良妇女。在没有看戏的日子里，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用竹枝作刀枪，插蒲蒿作翎子，模仿演员来一场武打戏，那一招一式也像模像样。戏以载道，寓教于乐，这些延续在乡野民间的剧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用王起、王国桐两个名字报考了两所大学，结果被南京东南大学录取。离家读书，却没有离开戏剧，他在大学里遇到同样爱看戏的词曲大师吴梅。四年的大学生涯，王季思汲取了丰富的古典戏曲精华，在品性、学养、见识方面都得到提升。

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浙江、安徽、上海教学，并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部分元剧和吴梅、王国维的著作，得其精髓，又加上他年少时看过大量戏作，有了研究的基础和灵感。在动荡的生活中，他每天晚上在冒着青烟的菜油灯下钻研到深夜。他确定研究校注王实甫的《西厢记》，可是，《西厢记》曲文有大量典故，曲白中夹杂着北方各地的方言、俗语。他毫不吝啬时间，对《西厢记》的几种版本进行校勘，



黄孝阳

2020年末，南京，暴雪肆虐。大地的一切，都陷入了寒冷的忧郁。维景国际酒店玻璃窗前，我拨打那个熟悉的电话，却永远不再有回音。同来开会的王尧老师发微信语音告诉我说：孝阳走了。我不敢相信，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颁奖在即，孝阳的长篇小说《人间值得》刚获得长篇小说奖，我到酒店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联系，讨论文学，特别是他刚杀青的长篇《新生》。这一切，都在2020年12月28日那个下午戛然而止。望着窗外的雪花，我流着眼泪，写下简短的小诗：“漫天狂风漫天雪，独立金陵思故人，故人不知何处去，空留余泪凝雪中。”

我和孝阳相识时间不长，但“迅速”成了好友。这起源于我在2013年出版的《王小波传》。我读到过孝阳写于西祀胡同纪念小波的文字。当读到“王小波之死，犹如一根巨大的铁钉，缓缓地钉进了心脏”，我深深地被他感动，在书的后记谈到这位自称“王门大弟子”的青年作家。2016年，我从山东南来苏州，在南京的文学活动中见到了黄孝阳，当时有点发愣：一样肥短的身材，滚圆的脸，一样是“70后”文艺大叔，一样是王小波的信徒，一样是小城低学历青年出身，一样是“伪单身”中年男，妻儿在远方，独自在他乡打拼。我们相视而笑，自嘲是“前世失散的兄弟”。于是，就有了各种酒场，胡吹海侃的聊天。我来南京，他请我吃饭，也深谈到半夜。我对他的“量子文学观”不熟悉，等到阅读了他的大量

根据所积累的元人杂剧、散曲的语言资料，对《西厢记》的文字语言作了详细的疏注，并对金圣叹批注的版本作了若干修正。王季思还广泛阅读元人杂剧、散曲、歌谣、笔记小说，遇到不懂的词句硬下工夫，抠通了才罢休，他一点一滴地储备、积累、丰厚资料，来互相参照对证，进行注释。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1944年他的第一本戏曲研究专著《西厢五剧注》在浙江龙吟书屋出版。当时正在抗战，纸张奇缺，该书用福建南平毛边纸印刷，出版数量不多。接着，他又广泛收集前人对《西厢记》的眉批和总批，加以精选，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集评校注〈西厢记〉》。由于这两本书基本恢复了剧本的原貌，又适应读者的水平和阅读习惯，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西厢五剧注》更名《西厢记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学术界反响很大，此后多次再版，发行总量达100多万册。

在王季思看来，元代戏曲作家关汉卿写有剧本60多个，但大多散佚。他的杂剧有悲剧有喜剧，题材广阔，佳作频出。王季思认为关汉卿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巨匠，是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1954年，王季思的论文《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在《人民文学》发表，带头阐明了关汉卿的伟大，在学术界树立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唐湜先生也跟我说起过王季思先生的一些趣事，王则椿先生则补充了一些细节。回溯到抗战时期，当时浙江大学为了躲避战火，把本部迁往贵州办学，同时在龙泉坊下设分校，坊下是僻静的山村，很少受敌机干扰，浙大师生习惯称它作“芳野”。当时在浙大任教的王季思与同事们住在一座用毛竹搭建的教工宿舍里，四边是茂密的松林，风雨来临时便松涛阵阵，大家给这座竹楼取名“风雨龙吟楼”。

有一次，爱好体育的王季思在操场上踢足球踢累了，回到“风雨龙吟楼”自己的房间里，趴在桌子上小憩，此时正好有斜阳映照进来，把他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同住一室的老乡夏承焘见状，拿粉笔把他的影子轮廓勾勒下来，结果像一头老虎，夏承焘又在墙壁上加了“睡虎图”三字。由于王季思平时不苟言笑，举止严肃认真，好与人争执论理，“王老虎”的绰号就在同学中传开了。

王季思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事必躬亲，对待学生宽厚仁爱、关怀备至，他收藏的图书、资料，随便让学生翻检，多年积累的卡片、笔记也提供给学生。遇到什么开心事，他常请学生吃蟹喝酒。在师生们的记忆里，王季思与人为善、热心诚恳。

1947年暑假，浙大进步学生薛天祀和夏文俊在杭州被国民党逮捕，王季思和夏承

焘得知消息后不顾自身安危，奔走营救。1949年，王季思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7月，中大学生赖春泉被捕，国民党秘密判处他死刑。地下党派人找到王季思，请他出面保释营救，他亲自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为赖春泉办理保释手续。

1948年夏天，42岁的王季思经老乡、历史学家刘节介绍，从杭州南下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一任就是42年，可谓是落地生根，无怨无悔。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随着时代大潮时起时伏，但几乎没有停止学术研究的步伐。他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享誉海内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论和古典戏曲研究的名家。

王季思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大学第一届中文系主任，他带领学生成立“泥土社”，鼓励学生多创作文学作品。“泥土社”的寓意即为文学来源于生活，植根于泥土、立足于大地。

1962年，王季思受教育部之聘到了北京大学，参与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负责宋、元、明、清部分。经过三年编辑，《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教育部推荐教材，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30年之久。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季思受教育部委托，在中山大学主持举办全国高校中青年教师古代戏曲研讨班，为全国高校培养一批研究古代戏曲的骨干教师。他还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中山大学中文系也成为全国首批古代文学的博士点之一。他同时还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编纂出版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等书籍。

1985年，时年79岁高龄的王季思依然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他领衔编校《全元戏曲》，但他不做挂名主编，与十几位不同年龄的编辑一起，定本、选目、标点、校勘、注释、眉批以及撰写题解等工作。他每天清晨起床，坐在书桌前看稿、编稿，忙个不停，全书所有的稿件他都逐页批阅，圈圈点点，纠正讹讹。几年后，他的手开始颤抖，口水也控制不住，为了避免弄脏书稿，他戴着大口罩伏案工作。1999年，十二卷本的厚重之作《全元戏曲》出齐，这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又一巨作。这期间，王季思的许多学术论文也陆续结集出版。以心为笔，以血为墨，几十载潜心钻研，几十载耕耘不歇，他出版的书稿字数达300万字。

王季思在中山大学播下了戏曲研究的种子，一批中青年学者逐步成长，出现研究的学术梯队，中山大学也成了中国戏曲研究的中心之一，而王季思无疑成为中山大学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一面旗帜。王季思热爱文学，倾力教学的一生，正如温籍作家、翻译家赵瑞麟先生对他的评价：“钻研古戏文犹如钻研严峻的人生”。

承蒙编委老师对“汪曾祺孙女”这个身份的看重，我有幸在《汪曾祺别集》之《晚饭后故事》《梨园集》两册做挂名主编。其实，以我对现代文学的认知和对汪曾祺作品的解读水平，实在达不到作为“别集”编委的门槛儿，实际参与的工作也实在寥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为什么是汪曾祺”。

在百度搜索过汪曾祺的名字，页面显示共有3580万个相关结果，真真吓了一跳。再一细查，豆瓣读书上收录了他211册（套）作品，有7450个粉丝关注，新浪微博上有他的超话，还有人专门在学术期刊上刊发过《新浪微博“汪曾祺栀子花”现象解析》，深入研究了为何自2016年以来，每年都有粉丝量高达百万、千万量级的自媒体大V大号，以及高校、媒体官微等接力转发汪曾祺的作品片段，并登上微博热搜。

倒退回二十几年前，我学生时代的语文老师们不少都没有听过汪曾祺这个“非著名”作家。而时至今日，汪曾祺俨然已经成为了主流文学圈儿里的“网红”代表，这不得不说是一件趣事。当然，相信这种流量和热度，也是汪曾祺去世20年后，越来越多出版社印他作品的重要理由，我觉得也是值得当代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关注的一种现象。

那么，为什么是汪曾祺？为什么在传统严肃文学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日渐式微的当下，网络上每天都有无数人分享他的某一席话、某几句词、某几篇文章？

为什么过去3天里，《徙》里县立五小的一句歌词“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连续出现在吉林大学、湖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诸多高校的官博上？

为什么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家里还在上小学的孩子缠着他（她），要去书店买一本汪曾祺爷爷的书？

王干老师前段时间在南京财经大学做了一场讲座，提出汪曾祺之所以成为了网络时代的一个现象级人物，在于其创作的包容性和厚度，实现了“古今、中外、南北、雅俗、现当代”五个层面的“打通”。这场讲座是面向新闻学院学生的，专业性比较强。我觉得从网生代普通读者的直观感受出发，不说教、不矫情、不沉重，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带着鲜活的烟火气，极容易带入和共情，文字却又无比的妥帖讲究，这才是老头儿的作品既能安放于书阁之上，又能游动于网络之间的原因。

当然，一些拥趸可能会觉得网络的断章取义割裂了作品的“文气”，但换个角度看，这种既能征服精英学者又能吸引微博草根的语言的精彩和醒目，也正代表着老头儿作品的独特魅力。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能否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和认同，无疑都是评判一个作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当代的文学应当更加尊重多元化和多样性，对于作者和

中的妥协苟且的警惕，对那些自称“贴近生活”创作中的媚俗气息的厌恶，更表现在他敏锐地捕捉到科技对世界的改变，特别是对人类生存方式、时空观念和价值观的改变。这些改变有些轰轰烈烈，有些则悄无声息，让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觉。

这几年与孝阳的交往，让我看到了一个有“赤子之心”与很高艺术追求的文学家。他的文学观有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更倾向于将世界看成某种结构性的存在，而这种存在不仅改变了我们，且改变了我们认知的现实：“我们在进入一个卡尔·波普尔所预言的开放社会，‘一个蜂巢似的有机体’。这是一个比《百年孤独》还要魔幻百倍的匪夷所思的新现实。它还在不断加速，且每一秒都比刚流逝的那一秒更快一点。我把这个新现实称之为知识社会。一个知识生产呈指数级增长的块茎结构，一个人可能真正获得主体性（自由）的个人时刻，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戏剧性现代性景观，一个‘技术奇点’随时可能爆发的前夜。”在我理解之中，他的《众生：迷宫》《众生：设计师》《人间世》《乱世》《人间值得》等小说，传统线性小说时空观、小说人物观、小说语言观、小说故事观，都被进行了彻底拆解和戏仿。历史、启蒙、人性、现实等诸多宏大叙事符号，也在他的小说中被结构化了，更多显现出存在的纹理和轨迹。读他的小说，犹如接近一片量子风暴，一张宇宙星云图，而纷繁复杂的信息中，依然能看到镶嵌在文字缝隙中对现实问题的批评和嘲讽、反思和宽容。

黄孝阳很多创作思路与王小波类似，但文学表现形态却截然不同。王小波是在90年代多元化开启之际，以先锋的智性探索和现实的反讽书写，呼应着文艺复兴磅礴的人性自由誓言，黄孝阳所要解决和面对的，则是一个被资本全球化冲击的中国，一个信息升级换代的“互联网丛林”世界。或者说，黄孝阳更像是“数字时代”的王小波。他们的文学内核都有着用文学开启智慧，增强中国小说精神探索力的核心价值观。



读者都给予更多的包容和宽待。我念小学的时候，按照老师要求买过一本《文学描写词典》，里面收录了很多名家大师的经典语段，用来给自己写作文“加词儿”。记得关于“眼睛”的条目收了《受戒》写小英子的一段话：“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

初时看到教辅书里有爷爷的作品时，我还是很有些骄傲激动的。仔细读了几遍，顿时熄了向小伙伴们炫耀的心思：“头是头，脚是脚”，这都是什么呀，写作文时这么放上去还不被老师把分扣光！没词儿！

谁成想，过了没多少年，《受戒》居然进了语文课本。这挺好，证明语文教育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强了。更可喜的是，很多年轻的读者或是从课本开始，或是从网络出发，进行了更更深广的阅读。他们“入坑”也许是因为吐槽、搞笑、美食、鸡汤，也许是因为老头儿的可爱，老头儿的好玩儿、老头儿的清新不做作，但只要沉下心来静静细读，就一定会被传统文化的美、语言文字的韵、慢慢静流的情所打动。届时，自可入手《别集》一套，相信这套权威学者、资深汪迷倾力编印的作品汇编，一定会带读者走近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汪曾祺。

豆瓣上有这样一篇书评：“自汪曾祺去世后，他的书不断地再版。尤其是近十年，汪曾祺作品的出版达到了一个高潮，无论是数量之多，还是版本之繁复，编选角度之多样，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当代作家里，无人可出其右。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汪老身后不寂寞，还邂逅了不少隔代知音。”

作为家人，深深感恩万千读者的追捧，也感谢各家出版机构的厚爱，但借此活动之机，也想给汪曾祺作品的出版热降降温，毕竟老头儿已去世20多年，不会再有过多未面世或此前遗漏的作品供反复编选，过度消费对于作家本人和出版机构的形象声誉都非益事。希望出版机构能将更多目光放到当代作家身上，更多支持中国文学的当下和未来。

也希望创作者、评论家、研究者们能够与网络时代实现更好的磨合共融，让更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和认可，吸引更多回归文字之美、品读生活之味。

黄孝阳依然期待着，回到作为人的整体，拥有人的主体性，在灵魂深处缝合诸碎片，量子文学观提供了富有整体性的路径图。甚至可以说，黄孝阳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我认为，他的小说是目前中国最先锋、最具探索性的文本。黄孝阳完全可以凭借这些文字，在当代小说史上找到他的位置。黄孝阳的文学观念是超前的，也是寂寞的。

然而，在纯文学不断哀叹边缘化危机的时代，在网络文学也面临科普短视频的挑战，担忧“文字被彻底取消”的时代，我们要如何给文学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黄孝阳在荆棘路上独行，仿佛找到了古老的人类文字刻在岩洞石壁的瞬间所带来的神性和智性，还有那些单纯的快乐和思考。黄孝阳的小说并不适合消遣，更适合作为某种“精神读本”，慢慢地读，反复地读，如同抚摸那些岩石上的文字符号，我们自然能找到内心的感悟和精神上的启迪。

文学家的尊严在于，文字让真正博大的灵魂不朽。2020年，我发表了一篇纪念王小波之死的小说，模拟1997年4月那个深夜发生在王小波身上的悲剧。今天，我也要把小说结尾这段文字献给小说家黄孝阳。王小波的“绿毛水怪”海底世界，最终会与孝阳的宇宙量子流世界相遇。他们都会变成少年的模样，在大海与蓝天中尽情畅饮欢笑。他们的身边，有十万只金色的喇叭齐鸣，一百万道蓝色的闪电在尖叫，一千万只绿色的海妖在歌唱：

他没有回答，不需再言，一切都已有了答案。死可怕吗？好像也没什么，可怕的是永恒的寂寞。没有欢乐，没有痛苦。他仿佛又回到17岁，伫立于大海边的黑岛礁。那个孤独而强壮的孩子，等待着神秘时刻的降临。他好像看到自己长出薄薄的、蹼，尖爪子。他纵身跳入大海，那一片虚幻的蔚蓝海底，点点星星的微光，就是超越此生此世的诗意世界。他的朋友们，那些强悍又深情的大海妖，轻轻地将他托举。他听到耳边有巨大声音传来，那些壮丽的音符，变幻成一个个山峰般大小的符篆，“自由自在”地飞翔着。

